



经济文化教育
学科建设丛书

中国近代文学史证

——郭长海学术文集

Z G J D W X S Z

JINGJIWENHUA
JIAOYUXUEKE
JIANSHE
CONGSHU

(上册)



吴晓峰 主编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中国近代文学史证

——郭长海学术文集

上 册

吴晓峰 主编

吉林人民出版社



《经济文化教育学科建设丛书》

编 委 会

- 主任：刘宪鲁 王栾周 卓越
- 副主任：杨明 李伯承 赫坚 赵骥民
刘保垣 宗国富
-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 | | | | |
|-----|-----|-----|-----|
| 孙振雷 | 刘琦 | 刘春明 | 李公君 |
| 李建华 | 阳曦 | 佟远堂 | 张洪波 |
| 吴晓峰 | 岳淑美 | 陈新春 | 杨以刚 |
| 赵小平 | 赵慧君 | 姜维公 | 郭淑云 |
| 高福顺 | 翟延慧 | 翟继峰 | |



总 序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是党中央、国务院高瞻远瞩、审时度势，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出的又一重大战略决策，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振兴老工业基地事关全局，绝非单纯经济部门的事，理应成为我省各项工作的统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如何围绕这个全局、服务这个全局、支持这个全局，是历史赋予教育的新的使命，是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今年以来，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我省相继举办了高等学校为振兴吉林老工业基地服务系列论坛和科技成果展洽会，召开了高等学校为振兴吉林老工业基地服务工作会议，印发了《高等学校为振兴吉林老工业基地服务行动计划（2004～2007年）》，在招商引资、引智方面，在产学研和校企联合抓科研项目方面，都取得了一些实质性进展，确实体现了高校为振兴服务、在服务中振兴高校的理念和思路，进一步增强了高等学校的机遇意识、服务意识、质量意识和改革创新意识，充分发挥了高校自身的科技和人才优势。争当振兴老工业基地生力军，为振兴老工业基地多出思想、出人才、出成果的热潮正在兴起。

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工作中，依据吉林省的农业优势，发展绿色生态型农产品加工业，对加快吉林省经济社会发展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目前我省农产品加工业存在一个明显不足，就是农产品加工的精深度不高，缺少具有高科技附加值和竞争实力的拳头产品。实践证明，高校与相关企业进行合作，联合进行科技攻关，是提高农产品深加工水平的一个有效途径。长春师范学院和吉林粮食集团有限公司在这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2004年8月，长春师范学院积极贯彻省委、省政府以及省教育厅的部署，抓住振兴老工业基地的机遇，与吉林粮食集团有限公司经多次洽谈，达成合作协议，共同实施“为振兴吉林老工业基地服务，农产品五大系列研发工程”。吉林粮食集团有限公司出资支持研发，长春师范学院承担主体研发工作。双方确定了“东北粮食智能化信息平台”、“杂多酸催化合成系列玉米淀粉聚醚多元醇”、“大豆中多种农药残留系统检测技术的研究”、“应用高压技术改性玉米蛋白质的研究”等15个研发项目。吉林粮食集团有限公司作为我省知名的大型粮农企业，依托高校走科研创新之路，积极为振兴老工业基地做贡献，表现出现代企业的远见卓识。这种校企合作的模式，为我省高校服务吉林老工业基地振兴提供了很好的范例，很值得其他学校和企业借鉴。

《经济文化教育学科建设丛书》是长春师范学院与吉林粮食集团有限公司合作进行的15个研发课题之一。该丛书将出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体系研究》、《东北亚政治经济问题研究》、《中国近代文学史证》、《富育光民俗文化论集》、《多维学术视野中的萨满文化》、《高句丽历史研究初编》、《东北地方民族史证》、《基础教育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中外教育史》等10部学术专著。这套丛书学科跨度较大，内容纵横捭阖，既有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体

系的研究，又有基础教育改革理论与实践的探讨；既有东北亚政治经济问题的深入论述，又有中国近代文学与历史问题的条分缕析。特别值得提出的是，长春师范学院近年来在学科建设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相继成立了昭明文选研究所、东北亚问题研究所、萨满文化研究所和吉林省高句丽渤海文献研究中心，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丛书的编著人员将他们的研究成果荟萃成洋洋 200 多万字的系列丛书，以服务于科教兴省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实际工作。我相信，这套丛书的出版不仅将推动长春师范学院整体科研水平的提高，而且将会对我省相关方面的研究提供很好的思路。

李军
2004年11月29日



近代文学史料的收集、整理与辨伪

——郭长海先生对近代文学研究的突出贡献

(代前言)

20年前，我还只是一名大学中文系三年级的学生，郭长海老师就给我们讲授明清文学与中国近代文学课程。当时，郭老师是最受同学欢迎的教师之一。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对中国近代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我选择的研究方向是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文学，没有能够向老师希望的那样做他的接班人。不过我对老师的成就却始终极为关注，认真阅读他发表的每一篇学术成果。近些年，郭老师因年迈已退休，不再担任教学工作，可是他仍然笔耕不辍，屡有新得。

回顾20年前，我坐在大学的课堂上听郭长海老师讲明清文学史课的时候，郭老师正是四十几岁风华正茂的年龄。而今，20年过去了，我由青年步入中年，而郭老师已是白发幡然一老翁了，但令我惊喜的是，20年中，老师不仅是增加了两鬓的白霜，而且更令人钦佩的是还多了摆在我们面前的几本厚厚的著作和一大摞论文。

让我们从头一本本翻起：

《秋瑾事迹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37万字。

《中华名人丛书·秋瑾》，天津新蕾出版社，1992年版，7万字。

《近代先驱者诗选》，长春出版社，1992年版，7万字。

《高旭集》，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58万字。

《柳亚子文集补编》，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21万字。

《秋瑾全集笺注》，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40万字。

《中国艳书博览》，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参编。

《中国艳歌大观》，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参编。

《大漠雄魂》，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参编。

《中国文学史》（近代部分），辽宁书社，1989年版。

《中国文学作品选》（清及近代部分），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以上著作达200多万字。

至于发表的论文，从1980年发表第一篇论文《秋瑾事迹质疑》起，到2004年的《〈慕莱堂诗文征存〉和秋寿南、秋瑾的诗词》止，共计130多篇，有60多万字。

面对如此巨大的数字，我不禁肃然起敬。

一个教师一生除了要用粉笔在黑板上写字，同时还能够用钢笔在方格纸上写出这么多的字，这里面凝结了老师多少血汗呢？我无法计算。

记得老师经常向我提起，希望有一天能够将自己一生所发表的论文结集出版。如今我将他的130多篇论文搜集起来，重新进行分类编排，也就有了这部《中国近代文学史证——郭长海学术文集》。我为能够帮助老师完成这个心愿感到光荣。同时，能够把郭老师关于中国近代文学史料学的研究成果介绍给学术界，这也是我为中国近代文学史料学的发展贡献的一份力量。我确信，郭老师的这部文集出版，必将使中国近代文学史的内容更加丰富和完善。

综观郭老师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他对中国近代文学史料

的搜集、整理与辨伪方面。成就是极为突出的。

对中国近代文学史料的搜集和整理，阿英先生首先做了奠基性的工作。从上个世纪 30 年代开始，阿英先生抢救了一大批有关近代文学的史料，并且加以搜集和整理，在此基础上，先后编成了《晚清小说史》、《晚清戏曲小说目》、《晚清文艺报刊述略》、《晚清文学丛钞》，包括《小说戏曲研究卷》、《说唱文学卷》、《小说卷》1—4 卷、《传奇杂剧卷》、《俄罗斯文学卷》、《域外文学卷》。计划中还有《文学卷》、《诗词卷》、《散文与杂文卷》，均未出。以及《近代反侵略文学集》，包括《鸦片战争文学集》、《中法战争文学集》、《中日战争文学集》、《反美华工禁约文学集》、《庚子事变文学集》。另外，还有研究史料与论文的合集《小说闲谈》1—4 集。这些丰富的史料，不仅开拓了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领域，而且，也为以后中国近代文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继阿英先生之后，研究中国近代文学的人多起来，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大批青年学者进入了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领域，除了学习和使用阿英先生提供的丰富资料之外，也有一些史料陆续被发掘出来。其中尤以魏绍昌先生的工作较为突出。早在“文革”之前，他就与刘鹗家属合作，共同编出了《〈老残游记〉研究资料》一书。后几年，他又独肩巨任，编成了《〈孽海花〉研究资料》、《吴趼人研究资料》、《李伯元研究资料》。这三种资料和稍后几年刘鹗后人编成的《刘鹗和〈老残游记〉研究资料》一书，共同完成了晚清四大谴责小说资料的搜集工作，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1984 年前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近代文学研究室主持编辑了一套《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包括近代 40 位著名作家，起于龚自珍，终于高旭。这是一套相当全面、相当完整、相当丰富的资料丛书。可惜，限于某种原因，仅仅出版了《秋瑾研究资料》、《严复研究资料》两种，其余便都不幸告于天

折。

正是在这些已有成绩的基础上，在其后的 20 年间，不少学者从事中国近代文学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包括日本的中村忠行、樽本照雄先生等，国内的张纯、刘德隆、颜廷亮等人，也都发现了一些近代作家与作品的史料，但都属于零篇的发现。近来，华南师大的左鹏军博士在这方面有了突出的成就，他发现了一批近代作家的诗文和近代传奇杂剧方面的资料，引起了广大研究者的注意。上述学者的工作，为中国近代文学史料学的深入发展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郭长海老师也是这期间表现非常出色的学者。他几十年来在中国近代文学史料学研究领域默默耕耘，不但填补了前人留下的许多空白，而且还对前人成果中的疏漏与失误加以澄清与纠正，他为中国近代文学史料学所做的贡献是非常突出的。

下面我将分几个部分，专门介绍郭长海教授在中国近代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和辨伪等方面所做出的贡献。

一、勤于收集——搜集方法与辑佚方面的贡献

郭先生对于中国近代文学史料的研究起步较早，而且硕果累累。早在 60 年代初，他就开始了对秋瑾的研究，而其成绩的取得，研究成果的表现，是在 80 年代之后。那时，他首先发现了当时研究界还没有人见过的一部秋瑾诗集——《秋风秋雨集》。该书是由徐自华编辑的，其中包括秋瑾的 20 多首佚诗。其后，则陆续有所发现。例如从《大公报》上发现一首秋瑾佚诗、两封佚信，还从《神州日报》上发现一篇佚文，从《申报》上发现一则佚简。还发现了秋瑾高祖父的文集《补斋文集》、秋瑾父亲写的一首诗，等等。

除了发现有关秋瑾的史料以外，还发现了以下多种史料：

1. 晚清四大小说家史料：

关于刘鹗的有：10 封佚信、5 篇佚文、3 首佚诗；

关于李伯元的有：2篇佚文、1首佚诗；

关于吴趸人的有：2首佚诗、1封佚信；

关于曾朴的有：8首佚诗。

2. 关于高旭的史料：除了《天梅遗集》以外的，计有佚诗2卷160多首；佚词1卷10首；佚信1卷10件，佚文1卷10篇。他在这些发现的基础上，编成《高旭集》，由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3. 关于柳亚子的有：柳亚子文集以外的资料，共辑得诗文150余篇，计21万字，已由中国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4. 关于弘一大师李叔同的有：诗7首，书信10件，文章36篇，这些都是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弘一大师全集》所未收的。现已编成《李叔同集》，待出版。

5. 关于《全清散曲》的有：套数96套，小令180余首，都是齐鲁书社1985年版谢伯阳编《全清散曲》所未收的。

6. 关于其他一些零散的篇章，有：

鲁迅佚文1篇：《域外小说集告白》；

苏曼殊佚信1件；

黄节佚诗11首，文1篇；

沈尹默遗诗16首；

于右任佚诗9首；

马君武佚诗5首；

宗仰山人佚文2篇，佚诗11首；

徐自华集外书信10件；

姚石子文章10篇；

刘半农早期文章5篇；

郁达夫诗1首。

另外他还整理了两位近代有名作家的文集，准备编成全集出版。

一是《叶楚伦集》。叶楚伦是南社诗人，又是著名小说家，还是一位政论家。诗词以外，小说有长、中、短篇，共一百多万字；为近代五大报纸写的社论、短评达三百多万字，还有戏剧等。研究近代文学、编写近代文学史不重视叶楚伦是不行的。可是过去由于有关材料搜集的不完整，人们对他所知甚少，只将他冠以鸳鸯蝴蝶派小说家便匆匆了事。如果郭先生所编 10 卷本全集可以面世，那么，将会填补对叶楚伦研究中的空白。

另一位作家是王无生。他也是南社诗人。他的出名是因为写了 3 篇有名的小说论文，即《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中国历代小说史论》、《中国三大小说家论赞》。由于有这 3 篇小说论文，所以近代小说研究界常常提到他。其实，这只是王无生成就的一个方面，他除了写小说论文外，还写小说，写戏剧，而且还写了很多文艺方面的论文。但是很可惜，由于一直没有《王无生文集》，所以，人们对并不能完全了解。因此搜集、整理他的著作并编成全集是非常必要的。

这些新发现的近代文学史料涵盖面极广，有诗人秋瑾，有四大小说作家，有相当大一部分是南社作家，也有一些是现代作家。这对于编辑这些作家的文集以及开拓研究新领域都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对这些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郭先生是如何完成的呢？说起来，郭先生有自己独特的搜集、整理史料的方法。

他的第一个做法就是坚持翻阅旧报纸。

人们通常的研究方式是到图书馆借来一大摞书，然后在书中认真探索摘抄。但是，郭先生认为这种方法对搜集史料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因此郭先生在搜集、整理近代文学史料方面体现出自己的一套独特工夫。当年阿英先生搜集、整理中国近代文学史料的时候是从冷书摊上搜集到许多清末民初的书籍、杂志，还有一些报刊，然后加以分类整理而成的。如今已经很难做到这一点

了。魏绍昌先生利用他在图书馆工作的有利条件，能够看到很多民国初至 30 年代的一些书籍和报刊，从而搜集到许多资料，然后加以整理而成。可以说，这些条件现在一般人很难具备，因为前人有幸得以见到这些图书、杂志的第一手材料，而且迄今为止这些材料已经被前人用完了。然而，郭先生却从近年整理出版和逐渐开放的许多清末民初的报纸中开拓出自己的研究渠道。比如《申报》、《大公报》、《民国日报》等旧报纸中有许多材料就不为阿英、魏绍昌二先生所知，另有《中外日报》、《时报》、《神州日报》等，也不曾为他们所注意到。正是这些旧报纸成了郭先生搜集史料的主要来源。对此，北京大学的夏晓虹先生曾评价说：“郭长海可谓是此道中具备硬工夫的少数学者之一，他从报刊文献入手，仔细爬梳，屡有收获。例如从《申报》广告中考察出第一部长篇翻译小说《昕夕闲谈》的译者‘蠡勺居士’本名蒋子让，重译者‘藜床卧独生’为管斯骏；晚清重要的‘社会小说’《黄绣球》的作者‘颐琐’，真名为汤宝荣，评点者‘二我’为陈其渊。”这个评价可说是再恰当不过了。

郭先生翻报纸的工夫真是达到了细致全面。他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去查阅各种旧报纸，每当外出开会、办事，他都要搜集当地的旧报纸来读一读。我们从他自己汇编的一部清末民初报纸目录中了解到，他已经翻阅过的报纸达 20 种。而他编辑一部《高旭集》，其中引用的报纸就有 17 种，杂志 27 种；而其参考的报纸还有 7 种，杂志 10 种。我们不能小看这个数字，因为这是郭先生从无数的报纸、杂志中一页一页认真阅读、考证后得出来的第一手资料。试想一下，这是怎样的日积月累的结果呢？例如，现有《申报》已经装订成册共 400 多本，每本平均约 400 多页，如果每天读完一本，总共也需要 400 多天，何况谁也不会天天都到书库里去一页一页翻报纸的。郭先生从 1980 年开始直到 1990 年利用教学的课余时间，花了整整 10 年的功夫，才读完了《申

报》。所以说，郭先生通过翻阅旧报纸、杂志来搜集、整理中国近代文学史料是他搜集方法的第一个特点。

郭先生的第二个做法是与第一个做法相连的，就是对所翻阅的报纸、杂志细致审阅，每条信息都不放过。

他总是把那排得密密麻麻的、陈旧的报纸一页一页翻阅，而且一条条信息都认真阅读，一点点小字也不放过。因为稍有疏忽就有可能从中漏掉十分重要的信息。例如秋瑾的一首佚诗就是在《大公报》的广告版中发现的，题目上写的也不是秋瑾的诗，而是《京师卫生女学医院赠诗》，粗看之下，根本无关紧要，但细读之下，才在末尾处发现“秋闺瑾”三个字。此广告宽不过一公分，长不过20公分，在众多广告中很难发现，如果不是郭先生的认真细致就很可能漏掉了。

又如，刘铁云给吴芝瑛的一封信，苏曼殊的一封信，以及鲁迅的《域外小说集告白》等，都是在《时报》的广告栏里发现的。有时在杂志上公然登出一则署名新奇的诗，粗读之下，未必能看出是出自谁人之手。例如，《清议报》有一首诗，是《赠星州寓公》，署名芬陀利室。这首诗可能有人已经见到过，但是未加以注意，经郭先生反复查证名人笔名索引等书，发现刘铁云有《芬陀利室诗存》，所以此芬陀利室是刘铁云的笔名，证明了此诗即为刘铁云的作品。

二、明于辨析——辨伪与析疑是郭先生对近代文学史科学的突出成就

郭先生不仅在辑佚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而且在史料的辨伪与析疑方面也做了很多的工作。日本著名清末小说研究专家樽本照雄先生在评论《秋瑾事迹研究》一书时，指出它的特点是：“资料的丰富发掘与精当的考证”，可以说道出了郭先生治学的特点。

辨伪多体现于对新出史料的鉴定工作上，对已有的说法提出

反驳性的论题。郭先生在这方面的突出成就，首先表现在对一些秋瑾佚诗的考证上。

前几年，学术论坛上多次出现过秋瑾佚诗，最早的是1981年，日本《清末小说研究》第4期上出现一篇秋瑾佚诗：《沪上有感》，并附手迹照片，提供者是日本著名专家丽泽生。国内迅速开始传递。上海的《学术月刊》首先发表徐培均等的文章，加以推荐。绍兴秋瑾故居立即将手迹复印件挂在墙上供人参观，一时颇为轰动。但是，郭先生觉得，一个人的手迹可能存在两种情况，一是本人自己的作品，另一种可能就是抄录他人的作品。果然，过了一段时间之后，郭先生从梁启超的《饮冰室诗话》中发现了诗的原作者，原来是杨度之妹杨庄，诗的原题为《上海旅舍作》，秋瑾不过是因爱好此诗而抄录下来的。一时间手迹问题得以澄清，秋瑾诗的真伪问题豁然开朗。可是过不多久，同样的问题又重复出现了，《秋瑾集》的第三版中增收了一首新发现的秋瑾诗，因诗无题，该书编者拟为《失题》，起句是“大好时光一刹过”。该诗是一位绍兴老人提供的，据说是秋瑾写在一本旧书背面上的。照旧例，秋瑾本人写的，当然是佚作无疑了。然而，这次郭先生又在清末日本出版的革命刊物《开智录》上找到了它的原始出处，原来作者是清末广东革命党人郑贯公，诗的原题目是《杂感》，郭先生又一次考证清楚了诗的真伪。

1992年《文献》杂志上发表了4首秋瑾佚诗，说是从民国期间成都的一家画报上发现的，内容涉及到成都桂湖风景。提供者认为，由此诗可以证明秋瑾到过四川。这是一大新发现。但是，郭先生读了之后却不以为然，他确信秋瑾一生从未到过四川，既未见记载，她也没有时间去四川，因此此诗决非秋瑾所作。接着，从诗的结构上、用韵上、意境上，郭先生都判断是前后两组诗，是前后唱和诗。前诗作者名为芳诚，这肯定不是秋瑾。后诗作者是芳诚的朋友，也决不是秋瑾。由于这几首诗内有

一句“亚子玉魂芳”，于是引起了柳亚子先生的公子柳无忌来自美国的关注，认为这组诗可证柳亚子和秋瑾有过交往。但经过郭先生研究考证，认为此诗非秋瑾所作，于是也就解除了柳无忌先生之疑。

其次，辨伪可以析疑，某些学术上争论的问题也可以通过辨伪来解决。举两个例子：一个是秋瑾生年的争论，另一个是关于高旭晚节的问题。

关于秋瑾的生年，历来有多种说法，通过争论后只剩两种。一为1875年说，一为1877年说。两种说法都有很充足的证据，双方相持不下。持1875年说者是秋瑾的后人，他们有秋氏家谱。历来所知，秋瑾生肖属猪，光绪乙亥年生，即光绪元年，1875年。后来又有了旁证：秋瑾之妹秋瑾生生肖属虎，生于1878年旧历3月。如果秋瑾生于1877年旧历10月，二人出生时间仅隔5个多月。一个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连续生下两个婴儿，显然是说不过去的。而主张秋瑾生于1877年的人，却都是秋瑾最要好的朋友，如吴芝瑛、陶成章、王时泽、冯自由等。他们的根据就是听秋瑾亲口所说的，而且后来还发现了秋瑾自己写的《兰谱》可以为证。郭先生深入研究了这一问题，认为虽然双方都有一定的根据，但是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有两个出生日，这是必然的，或者其中一方记载有错误，或者还存在其他原因而导致人们理解上出现差异，而他更倾向于秋瑾生于1875年说。带着疑问，郭先生认真分析了有关资料，终于从《兰谱》中找到了答案。秋瑾在《兰谱》中写道：

秋闰瑾，年二十八岁，十月十一日卯时生。适王。

一般人写《兰谱》必须注明生辰八字，即与人的生年有关的8个时间，包括：生年（含属相）、生月、生日与年岁。既然是

朋友订《兰谱》，这几点原应是缺一不可的。可是秋瑾的《兰谱》却含糊不清。那么，秋瑾为什么不写某某年十月十一日生，而偏偏只说是“年二十八岁，十月十一日卯时生”呢？显然这中间隐含着什么不愿为外人所知的东西，所以，秋瑾才有意将自己的生年、属相隐晦起来了。那么，究竟是什么难以让外人知道的原因呢？郭先生研究认为一定是和秋瑾的婚姻有关，即秋瑾结婚所报的年龄比实际年龄小两岁，从而推断出秋瑾的生年为光绪元年，即乙亥年，公历 1875 年。如今他的推测已经由最近发现的秋宗章的文章所证实。据秋宗章说，隐瞒真实年龄是由于媒人从中拨弄是非所致。于是争论了近 50 年的秋瑾生年问题，终于得到澄清。这是郭先生在秋瑾研究中的一大贡献。

在秋瑾研究中，郭先生类似这样的贡献还有很多。收在《秋瑾事迹研究》一书中的《秋瑾交游考》、《秋瑾疑事考》、《秋瑾佚著考》等文章，就是集中的体现。

关于高旭晚节问题的评价。高旭是诗界革命的诗人。他是日本政治大学法科学生，同盟会江苏支部的支部长，还是南社三位发起人之一，辛亥革命时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民国以后 3 次北上，任国会众议院议员，在政坛十分活跃。但是在 1923 年曹锟贿选中他竟然投了一票，得了五千块大洋，人们称之为猪仔议员，即贿选议员，为此成了当时人人唾骂，后世常常批判的对象。

可是，历史事实究竟如何？郭先生对此始终存有疑虑。所以他就有针对性地搜集有关高旭的历史资料。最后终于让他发现了两件资料：

一件资料说明当年曹锟贿选时，有 120 人并没有投曹锟的票，而是投了孙中山等人的票。这说明在参加贿选的人中还有 120 人投了曹锟的反对票。那么，如果高旭即在这 120 人中，就不该再称他是贿选议员。